

歐美佛學研究小史

J. W. 狄維著

霍翰附譯

(續上期)

畢爾奴夫的梵文佛典研究

一八三七年，巴黎亞洲學會 (Société Asiatique) 收到 B. H. 何德遜 (Brian Houghton Hodgson, 1800 - 1894) 從加德滿都送來的梵文佛典寫本八八卷 (譯者按：何氏為英國駐尼泊爾公使，在當地蒐集梵文寫本多達三八一卷)，畢爾奴夫立即開始閱讀這些卷子，據畢爾奴夫在一八三七年六月五日寫給何德遜的信上說：他自四月廿五日開始，即犧牲了所有的餘暇來研讀「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ṅḍarīka) ④。一八三九年，他完成了此經的翻譯工作，尋於一八四一年付印，但却延至一八五二年他死後

纔面世。畢爾奴夫翻譯了很多梵文佛典，其中有些是從「天譬」(Divyavadāna) 和「百喻經」(Avadānaśataka) 中譯出，後來都收在他的「印度佛教史概論」(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Paris, 1844) 中出版，但亦有許多是從未印行的。他死後，在他的遺稿中發現有好幾種已經差不多完全譯妥：如「小品般若」(Aṣṭasāhasikā - prajñāpāramitā)，「大乘莊嚴寶王經」(譯者按：此據漢譯舊名，原文為 Kāraṇaṁ dāvayūha。畢爾奴夫僅花了十天時間譯畢)，和「須摩提女經」(Samāghāva-dāna) 等⑤。此外，畢爾奴夫還仔細閱讀了好些卷子，甚至包括一些浩繁難解的經典，如「大事」(Mahāvastu)，「俱舍論註」(Abhidharma Kośavyākhyā) 等均在內。畢爾奴夫在其一生最

後的十五年中，他的成就是驚人的；她不但研讀了許多梵文佛典的寫本，還同時繼續研究阿吠斯坦語（Avestan 譯者按：乃古代波斯語的一種）和帕烈維語的文獻，翻譯了「薄伽梵陀·補羅那一」（*Bhāgavata Purāna*）一書。爲了展開他的巴利文獻研究，畢爾奴夫進而檢讀有關的錫蘭文、緬甸文和暹羅文的翻譯與疏釋；同時，他亦並未忽畧現代印雅語系（*Inao - Argan Languages*），如孟加拉語（*Bengali*）、摩羅提語（*Marathi*）、和拘陀羅提語（*Gujarati*）。在這些語言之中，大部分都得編纂字典，以便自己研究。在做了這許多工作之後，畢爾奴夫還須負起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的職責，何況他更常在病中。

畢爾奴夫強調，要研究印度佛教，必須以尼泊爾的梵文原典與錫蘭的巴利文原典爲基礎^{④⑦}。他認爲：通過這兩類文獻的共同部分，可以得出佛教的基本與原始的成分^{④⑧}。畢爾奴夫十分了解原典的研讀在探討佛教歷史上的基本重要性^{④⑨}。展現在他「概論」一書中的他對佛陀時代的印度的看法，佛陀的教義與發展，和佛教與種姓制度的關係等等，都是基於他對原典的精細研讀的成果。雖然，他所獲得的結論，此刻看來，有些須被修正，那是因爲佛教文獻的研究不斷進步的緣故。無論如何，經過一百三十年後的今日，他所寫的「概論」和法華經翻譯，仍然不會使讀者沒有得益。有關他這兩本作品內容上的考察，可以在溫德殊的那本書中看到^{⑤①}。

④⑦ “Papiers d'Eugène Burnouf conservés à la Biblio 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899, p. 158.

④⑧ *Ibid.*, p. 169.

④⑨ *Ibid.*, pp. 62 and 65.

④⑩ Introduction, p. 62.

④⑪ *Ibid.*, p. 31.

④⑫ *Ibid.*, p. 123.

④⑬ 見溫氏前引書 pp. 131-139.

加爾穆克文、蒙古文和西藏文譯的佛典

畢爾奴夫對西藏譯佛典在梵文佛典研究上的重要性知道得很

清楚，不過，在一八三七年，當他開始披讀這些典籍時，已經有學者研究佛教，這些學者是住在伏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加爾穆克人（*Kalmuk*，譯者按：屬蒙古人支裔）。班查年·巴格曼（*Benjamin Bergmann*, 1772 - 1856）曾經翻譯過一些他們的資料，並記錄了他對他們的風俗習慣的觀察。他所寫的「一八〇二年與一八〇三年加爾穆克人的游牧生活」(*Nomadische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üken in den Jahren 1802 und 1803*, Riga, 1804-5; 再版 *Oosterhout*, 1969) ^{⑤①} 一書，至今仍然是研究加爾穆克人與喇嘛教的一般性的重要資料。巴格曼指出：若要了解喇嘛教，則蒙古文和西藏語言的學習是必要的。

由一八〇四至一八〇六年，伊撒克·積高拔·舒密特（*Isaak Jakob Schmidt*, 1779 - 1847）爲了進行研究，決定住進加爾穆克人當中。舒密特後來成爲俄羅斯蒙古文與西藏文研究的開創者^{⑤②}，由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七年，他在「學院集刊」(*Mémoires de l'Académie*) 發表「四篇用藏文資料研究大乘佛教的長文」^{⑤③}。最後一篇，是以藏文本爲底本譯出的「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同年，阿歷山大·桑馬·狄·居里斯（*Alexander Cosma de Körös*, 1784 - 1842）發表「一篇對藏文大藏經「甘珠爾」(*Kanjur*) 的分析和一篇「丹珠爾」(*Tanjur*) 內容的要畧」^{⑤④}。菲力比·愛都華·富高（*Philippe Edouard Foucaux* 1811 - 1894）則研究「「普曜經」(*Lalitavistara*) 的藏文本，並且於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間出版「藏文原典和法文翻譯」^{⑤⑤}。一八四三年，舒密特亦出版了「賢愚經」(*Sage and the Fool*) 的藏文原典和德文翻譯，這是一本原來是以胡語說的在公元四四五年左右流傳於和闐（*Khotan*，今中國新疆省內）一帶的故事集^{⑤⑥}。此外，法蘭西·安東·溫·史富那（*Franz Anton von Schiefner*, 1817 - 1879）則從「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Mūlasarvāstivādaya*) 的藏文本中譯出許多故事，又出版了藏人多羅那他（*Taranātha*）著的「印度佛教史」的藏文原典和德文翻譯^{⑤⑦}。還有一本依據藏文資料寫出的書——「佛教」，那是 V. P. 華斯萊夫（*V. P. Vasiliev*）的作品，於一八五七

年在俄國出版，後來又在一八六〇年和一八六五年先後被譯成德文和法文^{②③}。

- ②① 參看 "Indo-Iranian Journal," XIV, 1972, pp. 265-7.
- ②② 參看 Franz Babinger, "Isaak Jakob Schmidt," 1779-1847, "Festschrift für Friedrich Hirth," Berlin, 1920, pp. 7-21.
- ②③ "Über einige Grundlehren des Buddhismus," Mémoires de l' Acad. Imp. d. Sc. de St. Pétersbourg, I, 1832, pp. 90-120, 222-262; "Über die sogenannte dritte Welt der Buddhaisten," ibid., II, 1834, pp. 1-39; "Über die Tausend Buddha einer Weltperiode der Einwohnung oder gleichmässigen Dauer," ibid., II, 1834, pp. 41-86; "Über das mahâjâna und Pradschnâ Pâramita der Baudhden," ibid., IV. 1837, pp. 123-228.
- ②④ Asiatick Researches, xx, 1839-9, pp. 41-93, 393-552.
- French translation by Léon Feer, "Analyse du Kandjour, recueil des Livres sacrés du Tibet,"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II, 1881, pp. 131-555.
- ②⑤ Rgga Teblér rol pa, ou Développement des Jeux, Paris, 1847-1848.
- ②⑥ "Dsanglun oder der Weise und der Tor.," St. Petersburg, 1843. 文辭目錄參看 J. W. de Jong, "Buddha's Word in China," Canberra, 1968, p. 23, n. 39. 也參看 Takahashi Moriaka, "Zô-Kan taiyaku: Kengukyô," Ôsaka, 1970.
- ②⑦ "Tibetan Tales," London, 1882; "Târanâthae de Doctrinae Buddhicae in India propagatione narratio," Petropoli, 1868; "Târanâtha's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Indien," St. Petersburg, 1869.
- ②⑧ "Buddizm, ego dogmaty, istorija i literatura," ç. 1, Spb., 1857; "Der Buddhismus, Seine Dogme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St.-Petersbourg-Riga-Leipzig, 1860; "Le Bouddhisme, ses dogmes, son histoire et sa littérature," Paris, 1865. 有關華斯萊夫資料，參看 Z. I. Gorbáčeva, N. A. Petrov, G. F. Smykalov, B. I. Pankrator, Russkij kniaevéd Akademik Vasilij Parlovic Vasiljev (1818-1900), "Očerki po istorii ruskogo vostokovedenija," II, Moskva, 1956, pp. 232-340.

法顯「佛國記」與玄奘「西域記」的法譯

對於印度佛教的研究來說，漢學家所做的工作亦非常重要。一八一五年，阿比爾許穆沙 (Abel-Rémusat, 1788-1832) 出任法蘭西學院的第一任中文教授，他譯出了法顯的「佛國記」。這本書在他死後由加拉布羅德 (Klaproth) 與朗德列斯 (Landresse) 出版^{②④}。他的繼任人史多尼斯拉斯·朱利安 (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 則譯出了玄奘傳和他的「西域記」^{②⑤}。

- ②④ "Foe Koue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de Fahan," Paris, 1836.
- ②⑤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Inde," Paris, 1853;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de Hiouen-thsang," Paris, 1857-1858.

哈地·比根德·與阿拉巴士打的南傳佛教研究

上文已經述及巴格曼和舒密特對加爾穆克人佛教的研究情形。至於南傳上座部各國的佛教，亦獲得更深入的了解；那是因為衛理會的傳教士 R·史賓斯·哈地 (R. Spenc Hardy, 1803-1868) 印行了幾本直接從錫蘭文取材的著作的緣故^{②⑥}。緬甸方面，一位羅馬天主教主教 P·比根德 (P. Bigandet, 1813-1849) 則使用緬甸文資料研究了「佛傳」^{②⑦}。在暹羅，亨利·阿拉巴士打 (Henry Alabaster, ?-1884) 亦翻譯了幾篇暹羅文佛典^{②⑧}。

總的來說，由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七七年之間，西方對佛教的知識已大大增加。雖然在這期間，巴利原典的出版為數尚少，但已有一本文法書和一本辭典出版，加上各東方研究中心所收藏的豐富寫本，遂使下一期的精密的研究活動成為可能。畢爾奴夫已經為梵文佛典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藏文資料的探索方面，這一時期亦已有了重要成果，但在次後的數十年中，這一支却是比較為人疏忽的。

雖然阿比爾許穆沙和史多尼斯拉斯·朱利安兩人在研究印度佛教歷史上引進了極重要的中文資料，但是這一方面，亦與藏文

研究一樣，在下一階段中的進步並不顯著。

⑥① “Eastern Monachism,” London, 1850; “Manual of Buddhism in its Modern Development,” London, 1853; “The Legends and Theories of the Buddhists,” London, 1866.

⑥② “The Life of Gaudama,” Rangoon, 1858; Second enlarged edition, “The Life or Legend of Gaudama,” Rangoon, 1866, third edition, London, 1880; fourth edition, London, 1911.

⑥③ “The Wheel of the Law. Buddhism illustrated from Siamese sources,” London, 1871.

第二章 中期（一八七七一—一九四二）

當然，如果我們要把一八七七年以前的初期的佛學研究與後的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但一八七七年可以視為佛學研究的一個新時代的起點，則有幾項理由：首先，一八七七年以還。有許多巴利原典校訂出版；其次，佛教梵文文獻亦自一八八一年以後開始增加出版的數目；而更重要的，則可能是在此後的三數年中，印度佛教方面出現了好些優秀作品，其中大部份都是由對此後數十年的佛學研究有相當貢獻的學者執筆。

十九世紀末梵、巴佛典的校訂及出版

首先，關於巴利佛典方面，一八七七年，浮斯保爾(Fausbll)，校訂的「本生集」(Jātaka)第一卷出版，而第七卷，其中包括安德遜(Andersen)所作的索引，則在一八九七年面世。奧頓堡(Oldenbergh)校訂的「律藏」(Vinayapitaka)是從一八七九年開始，到一八八三年完成。一八八一年，烈斯·戴維斯(T. W. Rhys Davids, 1843—1922)創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除上述文獻外，此後所有巴利原典在歐洲方面出版的，差不多都是由巴利聖典協會刊行。不過五部阿含(Five Nikāya, 譯者按：南傳阿含經稱「五部」，即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及小部，與北傳之四阿含畧異)則已早於一八八〇年開始出版。一

八八二年，「巴利聖典協會學報」(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創刊。一九三〇年，五部阿含已全部出版完畢，跟着開始出版註釋(Aṭṭhakathā)。至於聖典外的巴利典籍，如一八七九年由奧頓堡校訂的「島史」(Dīpaṅśa)，和一八八〇年特連奇拿(Trenckner)校訂的「彌蘭王問」(Milindapañha)，都是必須提及的。同時，在這時候，已有很多巴利原典翻譯出來。最先使是由奧頓堡與烈斯·戴維斯合譯的「波羅提木叉」(Pāṭimokkha)、「小品」(Mahāvagga)和「小部」(Cullavagga)（此三書即SBE, 13, 17, 20, Oxford 1881—1885）。至一八九九年，烈斯·戴維斯出版「長部阿含」(Dīghanikāya)英譯第一卷。事實上在一八九四年，他已經完成了「彌蘭王問」的翻譯(SBE, 35, 36, Oxford 1890—1894)。

梵文佛典方面，自一八五二年畢爾奴夫逝世以來，研究工作進展不大。由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間，唯一獲得出版的重要的經典是「普曜經」(Lalitavistara)，但校訂者羅贊陀羅爾·密多羅(Rajendralal Mitra, 1824—1891)所印出的是一個十分令人不滿意的本子(Bibl, Ind. Wark No. 15, Calcutta, 1853—1877)，最後一分冊在一八七七年刊完。一八八二年，愛米爾·辛納(Emile Senart, 1847—1928)出版他校訂的「大事」(Mahāvastu)第一卷，第三卷亦即最後一卷，是在一八九七年刊行。他這套書，至今仍是佛學研究圈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一八八一年，馬克思·繆勒(Max Müller)出版了大乘佛教最有名的經典之一——「能斷金剛般若經」(Vajracchedikā)的梵文本。兩年之後，他又出版了中、日兩國淨土宗的聖典：「無量壽經」和「阿彌陀經」(譯者按：此二經均名Sukhāvatīvyūha，以內容而分廣、畧兩半)的梵文本。另一本「天譬」(Divyāvadāna)，則在一八八六年由高威爾(E. B. Cowell, 1826—1903)和奈伊爾(R. A. Neil)兩人精細校訂出版。此書早已由畢爾奴夫在他的「印度佛教概論」中予以翻譯，因而十分出名。五年後，即一八九一年，漢歷克·赫恩(Hendrik Kern, 1833—1917)出版「本生鬘」(Jātakamālā)，作為「哈佛東方叢刊」(Harvard Oriental

Series) 的第一卷。一八八八年，沙羅特·旃陀羅·達斯 (Sarat Chandra Das, 1849 - 1917) 和哈里·穆罕·吠達耶布桑 (Hari Mohan Vidyabhusan) 開始出版自在安 (Kṣemendra) 所著的「譬喻如意解」(Avadānakalpalatā)。此書的最後一分冊問世，已是一九一八年。一八八九年時，米那葉夫 (Minaev) 出版了「寂天」(Sāntideva) 的「入菩提行經」(Bodhicaryāvatāra, Zap. Vost. Otd. Imp. R. Arx. Obšč., IV, pp. 153 - 228。到一八九八年，蒲仙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 - 1938) 出版了般若行慧 (Prajñākaramati) 對此書的註釋的第九章原典，全文則續於一九〇一至一九一四年間發表^①。一八九三年，高威爾出版了「佛所行讚」(Buddhacarita)，至於李夫曼 (Lefmann, 1831 - 1912) 所作的「普曜經」的新校訂版則早於一八八二年前上梓，但一直到一九〇二年纔能看到^②。

①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London, 1898, pp. 233-388; *Bodhicaryāvatārapañjikā* Calcutta, 1901 - 1914.

② 參看 *Lalita vistara* (ed. S. Lefmann), Vol. II, Halle, 1908, p.v.

辛納的「佛傳研究」

我們列舉在這些年代中所出版的梵、巴佛典，證明了當時的學者是如何積極地進行校訂佛典的工作。與此同時，他們還致力於佛典解釋。在這些先知學者們的作品中所討論的問題，是有着本質上的重要性的，因此在這裏必須對他們的著作稍加詳論。

首先是辛納的「佛傳研究」(*Essai sur la légende du Buddha*)。此書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時刊載於「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但一八八二年開始印行的第二版，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為在這一版中，序論和結論部份都已經修改，作者在裏面很精細地解釋了他的方法和由此所獲得的結果。他說，有關佛陀的故事，一方面有傳說的成份，一方面亦有真實的成份。過去的學者們認為：所有傳說的成份都是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之上增益的，因此祇要我們一旦從傳說的成分中脫出，有關佛陀的歷史上

的真實情形便會變得很清楚。這種方法，蒲仙將之稱為消減法 (subtraction)，在辛納時代前後是經常應用的。新的學者研究耶穌生平發展出一種歷史批判法也是同一的方法。但是，辛納相信，保存在佛本生故事中的那些傳說的，甚至是神話的成分，早在佛陀在世之前存在，而且已經構成了一個一致的體系。所以辛納從「普曜經」中大量取材，也就不足驚異了。至於巴利文獻方面，由於當時巴利聖典尚未出版 (指長部阿含等經典——譯者) 所以辛納無法上溯到這些原始的資料中。他僅能利用「因緣說話」(*Nidānakathā*，「佛統紀」*Buddhavaṃsa*) 及其註釋等巴利資料。辛納詳細研究了轉輪聖王 (*Caṅkavartin*) 及其七寶概念，並大人 (*Mahāpuruṣa*) 及其相好概念後，於是認為佛陀是太陽來的英雄 (譯者按：即舊譯之「日種」觀念)、大人、及轉輪聖王。在他降生之前，他是最高之神；他以一個光輝的形象由天上下降。他的母親摩耶 (*Māyā*)，代表至高無上的創造能力，同時又是蒼茫大氣的女神；她死後化身為「生主」(*Prajāpati*)，仍然繼續創造及滋養整個宇宙和宇宙神。有關佛陀生平的十二段因緣事蹟，辛納全部都是用這個方法解釋。

辛納把他自己的方法，描述為「歷史神話學」(*historical Mythology*)，以別於比較神話學 (*Comparative mythology*)。後者在十九世紀時是十分流行的方法，喜歡把諸神及神話中的人物，與太陽、雲、電等自然現象融為一體。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舉「火之下降與神酒」(*Die Herabkunft des Feuers und der Göttertrank*, Berlin, 1859.) 一書之作者阿多爾拔·古安 (*Adalbert Kuhn*)，和「比較神話學研究」(*Essay on Comparative Mythology*, London, 1856.) 「語言學講義」(*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London, 1861 - 1864.) 二書之作者馬克斯·繆勒，想已足夠。辛納雖受當時自然主義神學的影響，但他的優點在於開始嘗試把佛陀的神話作為印度及印度宗教概念的產物來解釋。

(未完待續)